



专家纵论

Asia-Pacific Strategic Arena:
Major Powers and Their
Relation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亚太战略场

—— 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时事出版社

专家纵论

Asia-Pacific Strategic Arena: Major
Powers and Their Relation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亚太战略场

——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4

ISBN 7—80009—707—2

I. 亚… II. 中… III. 国际形势—研究—亚太地区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5494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5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 字数：480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总策划：陆忠伟

主 编：傅梦孜

审 稿：陶 坚

湛取荣

季志业

袁 鹏

卷首语：把握世界局势 变化的脉搏

陆忠伟*

已故法国战略家雷蒙·阿宏曾有一句名言：我们已经给 20 世纪忙得头昏脑胀，哪还有时间来考虑 21 世纪。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上世纪 60 年代，那时距离 21 世纪还很遥远。但目前人类已经掀开新世纪的盖头，过去的遥远现在已经来临，过去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事情，现在已变成热门话题。^①“9·11”事件作为世纪开年人类突然遭遇的大灾大难，揭开了世局变化的新序幕。它对国际安全形势、国际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未来的国际战略环境比之过去，将更复杂多变。

*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 纽先钟著：《21 世纪的战略前瞻》第一章，台湾麦田出版社，1999 年初版。

总体形势：稳而不定

“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从深层次影响和改变着国际局势，世界陷入了局部动荡、局部战争、局部紧张的形势之中。冲突的局部性虽不至于破坏总体缓和的态势，但使世界局势从稳定的静态变为不安的动态，尤其是在军事安全层面，出现了“稳而不定”的特征。

在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格局中，随着多强的力量有所上升，各国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性日趋加强。其主要原因：一是大国力量的消长。俄罗斯、日本、欧洲、中国等对世界事务的影响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二是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和贸易领域的互相渗透增强，以及经济和军事安全领域的相互需求增强，各国处于一种相互影响日趋加强的状态，导致各国越来越强的“维和”共识的形成。三是对现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规则，各强虽有想法，但都不愿强行去打破它、挑战它，仍能遵守“合理冲撞”，仍能“维稳”。

“稳”是相对的，它指世界性战争爆发的“燃点”正随着军事冲突成本的上升及边际效益的下降在减少。这就制约了各大力量不愿轻易惹起战端，世界大战也轻易打不起来，所以我们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形势的主流。但这并不是说和平与发展是一种绝对的静态的平衡。这里包含有另一种含义，即“不定”是绝对的，这也是符合辩证法的。回想起上世纪末的情况，科索沃战争、韩朝的黄海之战、印巴的卡吉尔冲突、东帝汶动乱、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和动荡，实际应该横向联系起来看，其中包含着更深层次的矛盾。所以总的来看，世界性的局势相对较稳，但

局部形势却一直没有平静过。上世纪 90 年代，人们一度额手称庆，“再见了冷战”；但 10 年之后，谁料想再闻隆隆炮声，仍是以起伏动荡迈进了新的世纪。

如果要为当今国际局势“把脉”的话，我觉得可用“内有虚火，外感风寒”来形容。一方面，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显著转换，甚至更为复杂和尖锐，尽管这种复杂和尖锐的表现形式不同。冷战时期，主要矛盾是东西对抗、两超争霸，所有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到两制上，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上，它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其他一些矛盾。但冷战之后，两超争霸的矛盾消失，南北差距、民族矛盾、宗教极端、资源享有等诸多问题一起凸显出来，有些矛盾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其中，美国由于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文化实力，客观上对世界事务的发展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主观上亦将“主导世界”视为其努力维护的主要国家利益，决定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着深刻的利益矛盾，加之美国在处理一些地区问题、热点问题上不时表现出的双重标准和多重标准倾向，使其成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矛盾焦点。另一方面，虚火总要外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总要爆发。“9·11”事件正是将十多年来所积聚的矛盾一下子暴露了出来。从事件的背景看，它反映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的突发，有其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性，反映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一系列过程。

首先，在全球安全态势图上，出现了一条动荡高发地带。一是“塔利班”的崛起与崩溃，“巴勒斯坦人”激进派别持续不断的自杀性爆炸，实质上是冲突热点的拖延恶化，积重难返，“上访”无门，解决无望，致使弱势一方越来越多地诉诸极端手段的结果。

另外，“西雅图人”、“热那亚人”的反全球化运动反映出国际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及其“边缘化”现状，以及构成其基础的全球性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也表明“发达国家仍在竭力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① 因此，综合而言，我们似可以“亚健康状态”来概括目前的世界形势。国际形势好比万花筒，“9·11”摇动了其中五彩斑斓的晶片，使它离散聚合、分化不定，处于一个流动的过程中。

（一）冷战期间，美国亚太战略的重心置于东北亚；冷战结束后，该地区被认为有可能引发大国冲突的危险区域，因为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出现危机，极有可能将美日卷入。因而，中美日、中朝俄、美日韩、中朝韩等三边关系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

首先，“9·11”之后不久，美国在推进以反恐怖为中心的外交路线，这给朝鲜的外交环境带来了变化。“反恐划线”将有关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划出了美国头等重要的外交或安全议程；南亚局势的动荡，使美国对巴基斯坦核设施安全的关注，一度超出对朝鲜“两弹”核查问题的注意，从而使对朝外交的定位退居次要问题。在美朝关系进展脱力的情况下，韩朝关系、欧盟与朝鲜关系等都略显沉闷。韩国国内政局因大选在即而动荡，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已成了阳春白雪，和者甚寡。其次，日本立法通过《防止恐怖特别措施法》，将军旗打向了海外。“9·11”后，日本决策层汲取海湾战争交学费的教训，加大参与国际反恐怖与日美安全合作的力度。日本巡洋舰在战时远渡印度洋，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

（二）“9·11”之前，南亚地区一直因为印巴关系紧张而呈现

^① 刘华秋：《局部紧张、总体缓和》，《解放日报》2001年12月。

痉挛性动荡，但被认为美中俄不会卷入而被定性为“单打独斗”型。在“9·11”之前，美国寻求与印度发展新的战略关系。“9·11”之后，巴基斯坦因地缘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而地位上升。美国同时取消了对印、巴的经济制裁。阿富汗战争的变化，巴国内社会性动荡所显示的“宗教战争”的色彩，使得巴基斯坦核设施的安全性问题，以及克什米尔争端成为地区性的重要课题，从而使美印巴、中美巴关系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

（三）“9·11”之前，中亚的安全形势因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打击“三股恶势力”的合作取得进展而进入新阶段，“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表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出现重新组合。但“9·11”后，反恐怖合作关系的亲疏，在中亚国家关系中划下一条线。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正在冲击中亚业已形成的安全态势。众所周知，上海会晤的模式是5+1（中俄哈吉塔+乌）；而阿富汗战争前夕，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等筹建“反恐中心”之际则是6-1（中俄哈吉塔-乌）。如果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结束后仍驻军中亚，恐将影响该地区国家在安全合作领域的凝聚力。

（四）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处在调整过程，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增强。“9·11”之后，菲美两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关系进一步增强：美国向菲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派遣了反恐专家小组，协助菲武装部队打击阿布沙耶夫组织；美菲军方还签署了“五年工作计划”，并酝酿修改已签署50年的《美菲共同防御体系》，“以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未来的各种挑战”。

此外，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穆斯林人口占较大比重，战后这些国家奉行政教分离的基本国策，对多民族国家统一与经济发展有过贡献。“9·11”事件后，个别国家受到国际伊斯兰极端组织思潮的影响而引发政局动荡，与社会转型相交织，导致激进

宗教势力抬头，威胁国家安全与稳定，使之有沦为“东半球巴尔干”的危险。

（五）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与安全形势面临调整，宗教、政局、石油将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抬头，有可能危及某些国家的政权，进而引起地区局势的动荡。为此，迄今偏重于在经济和石油领域与中东国家发展国家关系的日本等国家，已将战略关注投向石油安全问题。

大国关系：合作领域扩大

理解世界局势，大国关系无疑是一个关键点。新世纪头年是国际关系大分化、大国安全战略大调整的一年。我们说国际局势总体仍比较健康，也是着眼于大国关系的变化上。毋庸置疑，大国间的竞争始终都会存在。但“9·11”后大国之间合作动力明显加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而言，各大国在反恐怖、反萧条、反贫困、反扩散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正在趋于一致。它们虽有同床异梦的一面，但在“四反”的共识上形成了合力和动力，促进了大国关系的调整与发展，大国间合作的内涵在扩大，在某些方面，大国之间的合作已突破传统安全思维束缚的“禁区”，正向新的领域延伸。

从反恐怖问题上看，反恐怖合作促动了大国关系重组。“9·11”事件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美与他国的关系出现了重新划线的问题。美推动建立“全球反恐怖联盟”，从而导致各大国调整外交日程与国家安全观，配合美国的反恐怖军事行动。尤其是阿富汗反恐怖战争的进展促进了大国高层会晤的空前活跃，国家关系的重新洗牌，外交成果的积淀，孕育着一个新的国际政

治格局的出现。由于区域安全态势的演绎及战略环境的变化，中美、中俄、中印关系；美俄、美巴、美乌关系；欧巴、欧俄关系的调整，以及中美俄、美俄欧、美印巴、中印巴等所谓的战略三角关系，都带有反恐怖合作的色彩。

就各战略力量的安全定位而言，它们在世界安全事务中的作用虽然得到了发挥，俄、日、欧等各大战略力量在反恐怖思维上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各大战略力量在改善对美关系上有了“直通车”，在参与国际安全上有了新跳板。德国、日本战略与安全思维出现了部分质的飞跃，它们积极配合美军的军事行动，抬高自身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地位，欲从配角跃居主角地位。这是美欧、美日调整彼此间关系的一个阶梯，而非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之内，美欧或美日双方仍将是安危与共。

美、欧、俄、中等国形成的松散反恐怖联盟，尤其是阿富汗反恐怖战争的进展，促进了大国间高层会晤的空前活跃。反恐怖战争“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亮点，也为两国关系注入了新内容”。^①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2001年12月8日访问俄罗斯前夕表示：“俄支持美反恐怖斗争，从而把双方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美俄关系有了‘根本性改善’。”

从世界范围看，继美俄、俄印之后，中俄决定成立反恐怖工作小组；俄酝酿举办“全球反恐怖论坛”。中美启动了反恐怖协商；印美首脑就加强反恐怖合作、网络反恐怖措施达成协议。此外，东盟成员国于2001年11月15日在马尼拉开会，讨论反恐怖问题。东盟与中日韩的“10+3”峰会也签署了反恐怖宣言；中国和菲律宾通过了签署有关引渡、打击跨国犯罪和毒品的走私

① [美]《华尔街日报》2001年12月18日。

协议。朝鲜决定签署作为国际社会反恐怖斗争主要手段的《制止资助恐怖主义国际公约》，并同时加入了《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从反萧条问题看，美国经济 10 年的繁荣，对亚欧一些国家经济起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目前美国经济的衰退，极大地影响了与其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从美日中或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看，各市场都是处于一种大市场的外延范围内，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尤其是市场容量大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与否，已经足以牵动区域或全球性经济脉搏的跳动。日本经济 10 年起不来和美国经济经过 10 年增长后衰退，成为“9·11”事件后人们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世界经济贸易的一体化促进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维稳”的共识，成为大国关系稳定或者说国际形势稳定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从反贫困问题看，南北关系在二战后讲了几十年，发达国家基本上只是拿出很少一点钱来救救急，而没有大力根除贫穷。“9·11”事件后，发达国家认识到贫穷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安全。反贫穷将在今后一时期内成为“北南”各国的一个共识，而这又会反过来影响到各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再从反扩散问题看，它是大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焦点。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扩散，在“9·11”之前就已经是大国关系中正在磨合的一个焦点，各国安全思想不同和对所受到安全威胁的感受不同，或者说各国在自己区域和国际事务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在总论上相同，而在对待各自具体情况上又有不同的情况。安全系数较高的国家往往重视自己的国家安全，忽略小国的安全；相反，战略武器数量较少的国家就更能感受到威胁的严重性。“9·11”之后，围绕核裂变材料的

生产及核设施的安全系数，大国关系中的合作面在扩大。2000年11月，中美就防扩散达成谅解，最近又恢复了防扩散对话。作为反恐怖下一阶段的反扩散将成为大国间的一个重要共识。这一共识的意义将大于其他三点。

可以说，上述“四反”工作已成为新世纪国际关系调整的重要内容，以及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起着催生的作用。这势必导致美国及各大力量对外战略目标优先顺序与外交政策的再思考与重大调整，并据此提出现代“大安全”政策的任务。在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已经确立了“本土防御”的最优先性。此外，“9·11”也使美国改变了外交政策的思维框架。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怖战争得到了各大战略力量的支持和协助，从而显现了国际双边和多边合作对美国的价值，这将构成美国调整其对外政策的动力，预计美国的外交思维框架将出现调整。^①

三大隐忧

虽然从大国关系的总体发展趋势判断，未来国际局势走向的基本面是积极的，但同样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方面。在我看来，这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第一，是地缘政治新棋局形成带来的挑战。美国从2001年10月7日发动对阿富汗的反恐怖战争后，美军进入了中亚和南亚地区。这一恐怖活动的重灾区正是经典陆权理论所描述的欧亚板块的结合部。有专家认为，在本世纪前期，世界局势的变化，

^① 香港《广角镜》(月刊)，2001年12月30日，马荣升文章。

国际权利的竞争，欧亚大陆仍为主要场所。阿富汗反恐怖战争的打响，使人想起了在核时代一度被遗忘的地缘政治学说，以及中国古代“假途伐虢”的典故。^①

正如斯皮克曼所说：“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地理为最基本因素，它是永恒不变的。”^②不言而喻，国际反恐怖联盟成员国具有不同的地缘战略利益与极其自然的防御本能的反应，如果从地缘战略行为来看反恐怖战争，它势将加速地缘政治新棋局的形成。有舆论指出，战争结束后，美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关系，将影响中亚国家安全合作的凝聚力。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拓展及外交上的合纵连横，对中亚安全态势产生了影响。欧亚大陆战略格局的变动势将牵动国际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已经并将继续出现重新组合的迹象。

第二，围绕反恐怖合作的“规则之争”将现实地成为国际关系磨合的重要内容。其一，如何定义“国际恐怖主义”？目前，广义的定义有 100 多种，比较集中的有 20 多种，迄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其二，由谁来主持反恐怖？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北约援引“集体自卫”条款，还是某个国家的单打独斗？从目前看，这三种形式的反恐怖都有。其三，反恐怖行动衡量敌友的标准：单一标准，还是双重标准？是否非敌即友？其四，是依法反恐怖，重证据，打得准，还是借反恐怖谋私？其五，如何避免出现“第二个阿富汗”，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标本兼治，彻底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根源？最近已有舆论认为中东是继阿富汗战场之后的“反恐怖第二战场”，而 2001 年

^① 吸取了本学者务虚研讨的观点。

^② 纽先钟著：《21 世纪的战略前瞻》第三章，第 49 页。

12月23日恐怖分子袭击印度议会大厦后，国际舆论又将关注焦点锁定在印是否会开辟“国际反恐怖第三战场”？从表面上看，这是反恐怖的“规则之争”，其实也是“后9·11”国际秩序的“规则之争”。^①国家关系的重新洗牌，外交成果的积淀，及相关反恐怖规则的确立，孕育着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出现。

第三，是反扩散问题。他是冷战后美国的主要国家战略目标之一。“9·11”事件使美国的军事聚焦点集中在打击塔利班和本·拉丹上，尚未安排好地区性和全球性反扩散的议事日程。但阿富汗战场尘埃落定后，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本身就含有反扩散的安全战略目标。反扩散战争成为美头等重要的安全日程，朝鲜半岛局势将非常令人担忧和关注。美对巴基斯坦及南亚地区核设施的管制前景如何；如果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长期战争，会不会引发核战争；即使没有战争，局势的动荡是否会威胁至巴印核设施的安全等，都将是非常令人担忧和关注的问题。

中国与世界

中国申奥成功、正式加入WTO以及在反恐怖问题上得到国际佳评，既说明世界需要中国，也说明中国对国际政经事务也正在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入世”姿态。因此，如何冷静观察世界，理性处理中国的对外关系，无疑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作者看来，以下几点应该是明确的。

第一，国际关系今后的发展，仍然离不开综合实力对比这一

^① 《“9·11”后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上海《解放日报》2001年12月29日。

重要基础。“一超多强”的关系即美国与诸强的关系仍是矛盾的焦点。它们利益交织、矛盾重叠。因为美国首先成为与各强的交织点和碰撞面，它与各强矛盾最大。中美关系的磕磕碰碰、美俄关系的虚虚实实、中日关系的停停走走、美印关系的冷冷热热都反映了这一点。

经过反恐怖战争的磨合，国际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美英关系、英俄关系、美俄关系在布莱尔的穿针引线、普京的柔道组合、小布什的强力作用下，发生了化学反应，美英“特殊关系”经受了“考验”；美俄关系“由冷转热”；英俄两国合作加强。更重要的是，英、俄在与美大幅改善关系的同时，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影响亦随之提高。此外，德、法、日、印等群雄并起，影响也愈来愈大。这对世界事务而言有利于形成“群言堂”的局面。国际关系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美、印、巴关系在曲折中调整、平衡，变换主角。以美国为中心看，其南亚外交主要围绕“第一”和“惟一”两个轴心转动。“9·11”之前，美国发展对印关系，其政策思想是“印度第一”，但并非“惟一”。“9·11”之后，巴基斯坦一度成为美南亚政策的“第一”，但并非“惟一”。美国同时取消了对印巴的经济制裁，“使本来可能需要一两年时间才能发生的转变在不到一个月内就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而使美得以运用因反恐怖战争而派生的对印巴的影响力，^①折射出美国重塑南亚权力板块的用意。

第二，区域安全态势出现新演变。欧洲自冷战结束以来，其战略环境已出现很大变化。科索沃战争在欧盟内部打出了一个快速反应部队的建军思想，反恐怖战争则使欧盟加快了司法一体化的步伐。“9·11”之后，国际恐怖活动构成了亚太地区面临的主

^① 美驻印大使布莱尔威尔语，《华盛顿邮报》2001年12月18日。

要威胁之一，反恐怖、求稳定成为各国安全领域的利益所在，从而对相关的地区热点问题及其走向产生深刻影响。美国搞“反恐划线”，将朝鲜半岛暂时划出重要的外交议程，美朝关系与朝韩关系正常化日程有所迟滞。南亚局势注入新变数，塔利班全线失利后，阿富汗的政权建设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上升为重要安全课题。美国的安全关注点目前在内陆亚洲，但从长远看，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仍是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中国应采取积极外交。一是中美关系，包括双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层次。目前中美双边关系中仍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决定了今后中美关系会在曲折中调整、变动中发展。但令人欣慰的是中美两国高层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在区域和世界事务中的影响都有清楚的认识，对两国关系对各自国内的影响也非常清楚，这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9·11”事件为中美关系合作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平台。如打击恐怖主义演绎出了反恐怖行动的呼应和中美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经济领域，中国加入WTO后，随着美国资本、金融、保险等进入中国市场，经济关系将成为中美全面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在区域经济中，目前中美有共同的利益，对区域经济合作的认识在加深，中国不会挑战美在亚太地区的既有利益等。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不会成为现存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中国提倡“入”字当头，“立”在其中，中国要成为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组织的一员，谋取平等的地位。所以，中美关系只会发展，不会倒退。正如2002年2月21日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举行会谈时所指出的：“30年前的今天，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结束了两国相互隔绝的历史，开始了交流与合作的进程。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所迈出的步子已为历史所验证。30年后的今天，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